

# 蔣介石與賀麟\*

黃克武\*\*

## 摘 要

本文以賀麟與蔣介石間的關係為主軸，探討蔣介石與知識分子間的交往，並試圖了解此類交往關係如何影響知識分子面對 1949 年離開或留居大陸的抉擇，以及 1950 年代中共的思想改造。賀麟以研究斯賓諾莎與黑格爾的思想、翻譯西方著作、會通中西哲學著名，也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抗戰時期，他與林同濟、雷海宗同屬「戰國策派」，又加入張其昀、錢穆等人所籌辦的「思想與時代雜誌社」，在理念上與宣傳上大力支持蔣介石的「力行哲學」與政治統治。蔣介石與賀麟的結合是政治與文化民族主義的結合。賀麟左批唯物辯證法與共產主義、右批胡適的實驗主義與自由主義，並從哲學史的角度肯定蔣介石與孫中山的繼承關係，是他為蔣所欣賞、重用的主要原因。然而，較令人費解的是 1949 年國府遷台之時，他選擇了留在大陸，之後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徹底推翻昔日對蔣的尊崇，改為歌頌毛澤東思想，甚至還以八十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賀麟 1945 年所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到 1986 年將之改寫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反映出他一生從「擁蔣」到「擁毛」的思想變遷。賀麟的個案顯示蔣介石與中共政權對知識分子所採取的不同策略，也凸顯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境。

**關鍵詞：**賀麟、蔣介石、1949 年、忠的哲學、中共思想改造

---

\* 收稿日期：2009 年 10 月 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2 月 3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一、前 言

哲學家賀麟(1902-1992)是一位思想敏銳而博學的學者，以研究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哲學思想、翻譯西方著作，與會通中西哲學而聞名於世。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的研究。例如，江沛將賀麟與林同濟、雷海宗、陳銓、何永佶等同屬於「戰國策派的核心人物」。林志宏與何方昱在研究 1940 年代中國思想界時，將之與張其昀、錢穆、郭斌龢、張蔭麟、朱光潛等人同列為「『思想與時代社』基本社員」。<sup>1</sup>張學智則認為賀麟不但瞭解西方哲學，而且具「新心學」的哲學思想，乃「當之無愧的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sup>2</sup>

「戰國策派」被認為「鼓動法西斯主義思潮」，賀麟也鼓吹「英雄崇拜」；<sup>3</sup>再者，胡適與竺可楨的日記均記載《思想與時代》雜誌之出版受到蔣介石(1887-1975)的經費補助，胡適說：「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sup>4</sup>至於蔣介石肯定儒家傳統、尊敬新儒家則是眾所周知的。總之，在抗戰期間，信仰三民主義的賀麟與孫中山先生接班人之一的蔣介石，在思想上有許多相契合之處，才會被支持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視為「擁護集權」。不過有關蔣介石與賀麟的關係，以往並沒有太多人深究。據史料記載，蔣、賀曾數度見面，蔣並邀賀去重慶講學，也曾予以經費補助。

---

<sup>1</sup> 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 13。「戰國策派」之名稱源於這些學人在抗戰期間創辦《戰國策》(1940-1941)，又在《大公報·戰國副刊》(1941-1942)中撰寫文章。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121；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頁 97。

<sup>2</sup> 張學智，《賀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 217。

<sup>3</sup> 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頁 6-7。

<sup>4</sup>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冊 8，頁 179，1941 年 10 月 12 日；竺可楨，《竺可楨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冊 1，頁 497，1941 年 3 月 17 日。

賀麟在 1945 年的《當代中國哲學》中讚許蔣介石的「力行哲學」，認為「當今國府主席蔣先生，就是王學之發為事功的偉大代表」。<sup>5</sup>然而 1949 年山河變色之際，賀麟選擇留在大陸，後來不但批判自己早期「醜惡」的唯心論傾向，改而肯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與毛澤東思想，<sup>6</sup>甚至在 1982 年以八十高齡「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sup>7</sup>

1949 年之後，賀麟曾多次撰文承認當年肯定唯心論的不當與吹捧蔣乃「嚴重的錯誤」。<sup>8</sup>例如，1951 年他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一文，坦承去西北參加土改啓發了他對辯證唯物論的新理解與對唯心論的批判。1955 年在批判胡適運動中，他不但痛批胡適，也「自己照一下鏡子」，認為在《當代中國哲學》所提到將康有為、梁啟超、熊十力、孫中山、蔣介石等看成是陸王哲學的復興，是錯誤地將儒家與資產階級唯心論相結合，來對抗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希望「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懂得階級鬥爭的真理」，因而「在思想上、生活上、學術研究工作上可以引起一個根本的改造」。<sup>9</sup>1987 年他在為新版的《文化與人生》作序時說：

我記得我在 1947 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sup>10</sup>我對於講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的意義，駁斥傅銅、胡適、馮友蘭等人反對此說的論點，及發揮知行合一說的理論，也還有其新穎之處。

<sup>5</sup>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5），頁 19。

<sup>6</sup>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1955），收入氏著，《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 467。這一篇文章原發表在 1955 年 1 月 29 日的《人民日報》之上，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看到此一報導，將之剪報保存。此一剪報計 4 頁，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檔號：HS-US01-111-006。比對《人民日報》的原版與收入《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的文章，筆者發現後者是刪節版，有許多比較「激進」而強烈的字眼、個別的人名與段落被刪除了。下面的引文將以《人民日報》的文字為準。

<sup>7</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頁 13。

<sup>8</sup> 有關賀麟在 1950 年代接受思想改造的過程，可以參見熊自健，〈賀麟思想轉變探析——從唯心論到辯證唯物論〉，《鵝湖月刊》，期 197(1991)，頁 15-25。

<sup>9</sup>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1955），《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頁 467；《人民日報》，1955 年 1 月 29 日。

<sup>10</sup> 該書最早係於 1945 年出版。1947 年，位在南京的勝利出版公司亦曾再版過一次。

不過嚴重的錯誤在於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蔣介石的所謂「力行哲學」，殊不知蔣的目的、方針、政策均與孫中山相反，因而使得這書很早就

在台灣出版。<sup>11</sup>

上文顯示他刻意地將孫與蔣分開，來說明他之所以犯錯是因為未能認清蔣背離了孫中山思想的真面目。<sup>12</sup>他晚年甚至完全抹殺蔣介石，轉而吹捧毛澤東的《實踐論》，認為毛在知行問題上承接孫中山，「深刻新穎，……內容豐富，義蘊深遠」。<sup>13</sup>由此可見，在毛澤東所曾改造過的知識分子之中，賀麟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徹底地「在靈魂深處」從擁蔣轉變為擁毛。賀麟也瞭解到如果像他那麼嚴重「反動」的人都可以被改造，那麼其他「包袱較輕」的人就更容易脫胎換骨了。<sup>14</sup>

賀麟的同事與朋友對此有不同的論斷。北大教授周輔成(1911-2009)比較同情地認為：賀與蔣的關係「無可非議」。張岱年(1909-2004)則說：「當年他在寫《當代中國哲學》中，提到蔣介石，有失學者身分。這是賀先生一生中的一個小小的缺點。」張書城說：「抗戰期間他被蔣介石接見過多次，……他政治上擁護蔣，哲學上同蔣探討」，是他一生中所「拖過一根庸人的辮子」。<sup>15</sup>當然這些學者也一致同意「解放後，他從唯心主義轉變為唯物主義，從三民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從一個愛國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經過了曲折的歷程，走上了光輝的坦途。」<sup>16</sup>這些言論都是從 1949 年之後的政治立場與以賀麟的自白為基礎，所做的論斷。然而究竟要如何看待蔣、賀的交往？賀麟在 1949 年之後為何要背離國民黨與蔣介石？本文嘗試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釐

---

<sup>11</sup> 賀麟，〈新版序言〉，《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 2。

<sup>12</sup> 在《當代中國哲學》中他曾說：「蔣先生提出『力行』之概念，實把握住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真義。」頁 115。

<sup>13</sup> 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頁 208-209。

<sup>14</sup> 賀麟說：「像我這樣有了如此深重的反動唯心論思想的人都可以改造過來，得到新生，其他的包袱較輕的舊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信心與勇氣更可加強。」參見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 年 1 月 29 日。

<sup>15</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406、36。

<sup>16</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402-403。

清蔣、賀的交往關係與兩人在思想上的交涉，藉此觀察中日戰爭期間蔣與知識分子的互動，以及此種關係對 1949 年之後留在大陸之知識分子的影響。

## 二、賀蔣交往：一般文獻中的賀蔣關係

1931 年 9 月賀麟結束留學生活，自歐美返回中國，在胡適的協助之下任教於北大哲學系，教授西方哲學。<sup>17</sup>九一八事變爆發，他應老師吳宓之邀，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德國三大偉人處國難時的態度〉(1931)、〈斯賓諾莎生平及學說大旨〉(1932)；<sup>18</sup>後又發表了〈新道德的動向〉(1938)、〈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1938)等文章，提出振奮民族精神、弘揚學術文化與實行政治革新的主張。1936 年賀麟升任北大教授、當選中國哲學會理事，他所翻譯魯一士(Josiah Royce, 1855-1916)的《黑格爾學述》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時賀麟在學術界的地位已建立，有人認為 1931-1937 年抗戰爆發前，「是賀麟學術思想的勃發期」。<sup>19</sup>1937 年抗戰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校南遷。該年底，賀麟與錢穆、湯用彤等人經長沙赴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sup>20</sup>賀麟與蔣介石關係的建立就是在去昆明之後才開始的。

有關蔣介石與賀麟的接觸，張祥龍的〈賀麟傳略〉、彭華的〈賀麟年譜新編〉與 1986 年 10 月賀麟在北京所辦的「賀麟學述思想討論會」的發言紀要，有簡要的說明。賀麟最早與國民黨接觸是受邀到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任教。<sup>21</sup>

<sup>17</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417，賀麟說：「胡適讓我當了一名講師，二〇元錢一個鐘頭，一個月六個鐘頭，共一二〇元錢。」

<sup>18</sup> 1928 年起吳宓集合了在清華教書的「學衡派」同志，以《大公報·文學副刊》為「宣傳作戰之地」，《吳宓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冊 4，頁 196，1929 年 1 月 16 日。1929 年 1 月之後改變了編輯方向，不再由吳宓個人主持，改為委員會，並邀朱自清參加，「增入新文學及語體文及新式標點」，「為一公共場所，每一作者，不論何派何等，均得在此中自行表見。」見同上，頁 197。

<sup>19</sup> 彭華，〈賀麟年譜新編〉，《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第 1 期，頁 81。

<sup>20</sup>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 183-186。

<sup>21</sup> 有關該校的狀況可見崔明忠，〈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研究（民國十六至三十六年）〉（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第一次任教的時間是在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0 月，共一年。當時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1892-1963)同時也兼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他注意到賀麟所發表的文章與在學術上的表現，曾多次邀請他去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教哲學。周炳琳是留學歐美的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與國民黨及學界之關係均十分深厚，多次出任政府官員並兼任黨務工作。1930 年代初期，周炳琳曾參加胡適、蔣廷黻等人所組的《獨立評論》社，<sup>22</sup>他所扮演的角色工作不但是學者，也是政學之間的聯繫人，更直接地說，就是替蔣介石拉攏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而賀麟就是目標之一。<sup>23</sup>1938 年 10 月，賀麟同意應周炳琳之邀去重慶教書。他之所以接受徵召，赴蔣介石任校長的黨校任教，有許多不同的因素。張祥龍說，賀麟去重慶是因為他早在留學時期就「從思想上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心要以「學術來救國」，再加上他對西南聯大只重視繁瑣考證和「猶唱後庭花」的鬆垮風氣很受不了。<sup>24</sup>賀麟自己則表示「是錢穆勸我去的」。<sup>25</sup>

<sup>22</sup> 周炳琳是創社 11 位社員之一，不過他在該刊發表的文章不多，僅有 4 篇。有關周參與《獨立評論》社的情況，可參見張太原，《獨立評論與 20 世紀 30 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47-48。周曾擔任過的政府職務，還有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副秘書長。見上書頁 208。

<sup>23</sup> 胡適與周炳琳是好友。1931 年 7 月 31 日，胡適記載：「下午與周梅蓀長談，也關政治。他是國民黨員，但終因北大的訓練，不脫自由主義的意味。」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冊 6，頁 593。有關胡適與周炳琳的交往參見張友仁，〈周炳琳教授和胡適教授的友誼〉，<http://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6615> (2009/9/10)。馬敘倫也曾在北大教書與周炳琳共事，他說：「廿四年……法學院長是周炳琳（北大學子，五四運動裏的一員），……周炳琳是國民黨黨員，也做過教育次長，不免是政府派。」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台北：龍文出版社，1994），頁 86。

<sup>24</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69-70。

<sup>25</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418。錢穆與賀麟交情很好。他說：「兩僧〔吳宓〕辦此副刊〔《大公報》〕時，特識拔清華兩學生，一四川賀麟，一廣東張蔭麟，一時有『二麟』之稱。賀麟自昭，自歐留學先歸，與錫予〔湯用彤〕在北大哲學系同事，與余往還甚稔。」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157。有關錢穆與蔣介石的關係，見錢穆，〈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中央日報》，1975 年 4 月 16 日。1942 年春，他於成都與一百多人同時晉見蔣介石，此次僅短暫會面，並未交談。不久之後，蔣於成都軍官學校單獨召見錢穆。有關這一次見面時間，錢穆已不復記憶，而其經過，他也說：「所談之詳，已不盡記。」有趣的是在蔣檔中對於當次會面卻留下詳細的紀錄。該次見面的時間是 1942 年 6 月 22 日。〈事略稿本〉記載「正午接見錢穆教授，約談一小時，留進午餐，公謂彼對中國歷史與哲學有研究者也。」見〈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100165022。此外，〈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80114018009，有「蔣中正與



有關賀麟在中央政校教書的情況只有非常簡短的記載。賀麟說，教育長陳果夫(1882-1951)要他照著戴季陶(1891-1949)與蔣介石的說法來教哲學，但當時上課中一提到蔣的名字要全體起立，「提一次，起一次」，賀麟可能認為如此讓學生行禮如儀，不便於授課，就以自己的方法來教：

我到中央政校……去時作了宣布，還舉行了典禮。學校中，一個最重要的人，教育長，是陳果夫，他最壞。有一次他讓我去見他。他住我樓上。他問我：你開什麼課？我說：哲學概論。他又問：什麼內容？我說：中西結合。他又說：我看到戴季陶的書出來了，蔣先生的書也有了，發揮了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照那講不會錯的。我聽了，但未照那個講。因為有個問題，一提到蔣介石就要全體起立，提一次，起一次。所以我儘量不用這些名詞。結果挺受學生歡迎……。<sup>26</sup>

文中所說戴季陶的著作應該是 1925 年出版的《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1945 年版改為《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蔣介石的著作則是 1935 年 9 月 14 日至 19 日在峨嵋軍訓團講的《國父遺教概要》。<sup>27</sup>賀麟對於這兩本書應不陌生，但因為不願意上課時同學時時起立，沒有接受陳果夫的建議。這很可能也是因為他與陳果夫關係欠佳所致（上文曾說陳「最壞」）。其中一個原因是賀麟是由周炳琳引介來教書，周屬於朱家驊系統，在國民黨內朱家驊早期與 CC 系<sup>28</sup>關係尚佳，自 1938 年 CC 系進入教育系統、1939 年朱家驊任組織部長後，雙方日益衝突。後來周炳琳與陳果夫鬧翻而辭職。<sup>29</sup>賀與周同進退，1939 年

---

錢穆討論宋明理學儒家思想等談話紀要」，詳細地記錄了兩人談話的內容。

<sup>26</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418。

<sup>27</sup> 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詮釋深受戴季陶的影響，他在 1937 年 7 月 6 日的日記上記載：「看《三民主義哲學基礎》完，此書已看完十遍，實不忍掩卷也。」王奇生，〈蔣介石的閱讀史——以 1920-1940 年代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探討〉，「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9 月 14-16 日，頁 422。

<sup>28</sup> CC 系，是由陳氏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所領導的一個政治派系，即「中央俱樂部」（有的人稱之為「組織派」），它的英文名稱是“Central Club”。CC 系的實力主要分布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尤其是組織部、中統局、地方各級黨部和教育系統。〈CC 系〉，<http://baike.baidu.com/view/368044.htm> (2010/1/27)。

<sup>29</sup> 有關周與陳的衝突，可參考張友仁，〈經濟學教授周炳琳傳略〉，<http://www.05760576.com/>

10月，一年期滿後，賀麟謝絕了陳果夫的挽留，返回昆明教書。<sup>30</sup>

在中央政校教書期間，蔣介石曾經在某個週六，臨時起意到學校接見賀麟，不巧賀麟赴城內訪友，未能見面。之後，賀麟曾帶著自己所出版的《黑格爾學述》與個人簡歷、講稿等，請陳果夫轉交「蔣委員長」。<sup>31</sup>

第二次是在1940年，「經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同意，賀麟二度借調到中央政治學校講學半年」。期滿後，他再度回到昆明。<sup>32</sup>這一年的年底，蔣介石讓秘書拍電報到昆明，約見賀麟。<sup>33</sup>蔣介石為何在此時想約見賀麟，需再深入探究。無論如何，1941年初賀麟如約飛至重慶，由陳布雷(1890-1948)陪同在黃山別墅見到蔣介石。<sup>34</sup>這應該是兩人第一次見面。張祥龍說：「賀對蔣講到了他要介紹西方古典哲學、貫通中西思想、發揚孫中山三民主義精神的想法。」蔣則答應由政府出資，建立「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周輔成說：「當蔣介石問他需要作什麼的時候，他只說要一點錢辦一個編譯委員會，學嚴幾道介紹西方正宗哲學於中國。」<sup>35</sup>據賀麟表示，1942年他又與蔣見過一次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在昆明教書，蔣介石讓秘書打電報要我回重慶。我與陳果夫一同去見蔣介石。蔣介石把我的書圈的圈，點的點，劃的劃，甚為認真。」<sup>36</sup>當時聯大哲學心理系教師被蔣介石電召赴渝講學、見面者，只有馮友蘭和賀麟兩人。根據馮友蘭所述，蔣對他十分禮遇，每次他去重慶，蔣都送帖子來，請他去吃飯。馮友蘭母親過世時，蔣還送了輓聯。馮也多次藉機向蔣進言，要他「開放政權，實行民主憲政」。<sup>37</sup>賀麟與蔣的關係似乎不如馮蔣關係那麼親密。

在賀麟與蔣介石見面之後的半年，亦即1941年6月，西南聯大內國民黨

---

[Article/ls/rw/200611/345.html](http://Article/ls/rw/200611/345.html) (2009/8/31)。

<sup>30</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70。

<sup>31</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418。

<sup>32</sup> 彭華，〈賀麟年譜新編〉，《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頁82。

<sup>33</sup> 張龍祥，〈賀麟傳略〉，收入《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70；彭華，〈賀麟年譜新編〉，《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頁82。根據蔣檔，蔣約見賀的時間應在1941年初，下詳。

<sup>34</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73。

<sup>35</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70、12。

<sup>36</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418。

<sup>37</sup> 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159-162。



的組織工作也在積極地進行。根據姚從吾(1894-1970)寫給朱家驊的信，負責籌備工作的姚從吾經過審慎地考察，推薦周炳琳、陳雪屏、賀麟、田培林、鄭天挺五位教授入黨。1941年7月23日召開了西南聯大全校黨員大會。賀麟等人與查良釗、錢端升等人一起「成爲西南聯大開展國民黨黨務的中間力量」。<sup>38</sup>

此時賀麟與國民黨所主導的文化事業有更爲密切的關係。大約在賀麟入黨前兩個月，張其昀在重慶走訪了賀麟的密友張蔭麟，「擬糾合同志，組織學社，創辦刊物，在建國時期從事於思想上的建設」。張又邀約了賀麟、錢穆、謝幼偉、朱光潛等人參加。蔣介石聽到他們的計畫之後「備加鼓勵」，並允予經費補助。<sup>39</sup>《思想與時代》出刊之後，在侍從室擔任文宣工作的陳布雷曾閱讀該刊，譽之爲「篇篇精湛，甚爲可喜」。<sup>40</sup>1941年9月20日，賀麟恩師吳宓閱讀了剛出版的《思想與時代》第一期後，覺得「甚欣佩，且感奮」。兩天之後，賀麟前往謁見吳宓，並報告蔣介石對該刊的大力資助，給了張其昀14萬元。<sup>41</sup>

另一個蔣介石所贊助的文化事業，是上述由賀麟單獨負責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此會也於1941年成立，在抗戰過程中對推動哲學研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賀麟的同學與好友謝幼偉在〈抗戰七年來之哲學〉很精要地談到該委員會的運作：

兩年前中國哲學會組織了一個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由賀麟先生主持。目的是在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洋正統哲學的名著。所譯的書都是經過選擇的。所請的譯者，則不惟是哲學專家，且是該一類書的專家。譯者每譯一書，都得寫一篇長序來說明是書的內容。譯言有難解之處，

<sup>38</sup>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爲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38-139。

<sup>39</sup> 桑兵，〈抗戰時期國民黨策劃的學人辦報〉，收入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台北：政大出版社，2008），頁254-259。有關《思想與時代》的一個最新的研究是上引的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

<sup>40</sup> 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爲中心〉，頁94。

<sup>41</sup> 吳宓，《吳宓日記》，冊8，頁175-176。1941年9月22日吳宓對此事頗爲感嘆，他說：「夕，麟來。知昀在蔣公處領得十四萬元而辦《思想與時代》。該刊稿酬每千字\$30云。宓念昔經營《學衡》等，不爲名利，不受津貼，獨立自奮之往迹。不覺黯然神傷已！」

還須加以注釋或按語。譯成之後，且須經過另一哲學專家的校閱才能出版。其工作的程序，是非常謹慎的。<sup>42</sup>

該委員會最早出版的四本書分別是：賀麟譯斯賓諾莎的《致知篇》(*Treatise on the Correc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陳康譯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Parmenides*)，<sup>43</sup>以及謝幼偉譯魯一士的《忠之哲學》，樊星南譯魯一士的《近代哲學的精神》，各書均由商務印書館印行。<sup>44</sup>

其中謝幼偉所譯魯一士有關「忠」的一書，涉及上述胡適所謂「擁護集權」的態度，尤其值得注意。<sup>45</sup>譯者在序言中表示，此書之翻譯受到賀麟的鼓勵：「魯一士這部《忠之哲學》，我在民國二十五年春季，就打算把它譯出。當時曾譯了四五千字，即以事停止。到去年秋季，友人賀自昭（麟）兄，提議要我翻譯這書，纔繼續在八個月的時間內，把這書譯成。」<sup>46</sup>出版之前，謝幼偉為該書寫了一篇導論，名為〈魯一士的倫理觀〉，先刊於《思想與時代》（第4期），在文中他說：「在目前抗戰建國期中，忠義之士，雖增了不少，然不忠不義的漢奸國賊如汪精衛之一流，不也仍有許多嗎？……忠德之提倡，仍有必要。」<sup>47</sup>不但如此，謝幼偉翻譯此書的過程中曾得到張蔭麟、賀麟與郭斌蘇等

<sup>42</sup>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頁154。

<sup>43</sup> 這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一篇，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對陳康的譯本給予高度的評價：「於介紹西洋哲學名著方面，尤其開一新紀元」，頁40。亦見鄒振環，〈《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超越西方的一種嘗試和雄心〉，收入氏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頁418-422。

<sup>44</sup> 樊星南應是賀麟的學生。在《當代中國哲學》的〈序言〉中，賀曾說該書第三章「是三年前在青年夏令營的一個演講，由樊星南君的筆記整理而成的」，頁4。此書出版之後，可能曾贈送蔣介石一套（上、下兩冊），目前在台北中正紀念堂的蔣氏藏書之中有《近代哲學的精神》（上、下冊，典藏號：利103.1、103.2），封面上有「樊星南譯述，馮文潛校閱」的字樣。馮文潛（1896-1963），專研西方哲學史與美學，時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

<sup>45</sup> 魯一士著，謝幼偉譯，《忠之哲學》（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抗戰時期對「忠」與「英雄崇拜」的討論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戰國策派學人討論得很多，謝幼偉的翻譯與此思潮密切相關。例如林同濟即主張「要用對民族和國家的『忠』的觀念代替傳統的『孝』的意識，這種『忠』不是盲目的愚忠，是一種引導全民族適應世界潮流的『大政治時代倫理』。」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頁6，以及該書第5章的詳細討論。

<sup>46</sup> 謝幼偉，〈譯序〉，《忠之哲學》，頁1。

<sup>47</sup> 謝幼偉，〈譯者導論〉，《忠之哲學》，頁24。

人的協助。<sup>48</sup>如上所述，這幾個人都是《思想與時代》社的核心成員，也與吳宓等人的「學衡派」有密切的關係。謝幼偉所譯《忠之哲學》一書於1943年由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魯一士是美國哲學家，研究黑格爾。賀麟說：「魯一士……是美國最偉大的新黑格爾主義者，是美國系統哲學成立的柱石。他與詹姆士〔案：即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齊名，是詹姆士的好友，同時是詹姆士的對頭，美國現代的哲學幾有不歸詹則歸魯的趨勢。」<sup>49</sup>在中國思想界，因為胡適師承杜威，在《新青年》中介紹「實驗主義」時，將詹姆士放在「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的思想系譜中介紹到中國來，<sup>50</sup>因此，在民初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就成詹姆士思想一枝獨秀，魯一士則並不有名。賀麟對此深感不滿，他說：「我想詹姆士死而有知，也應該替魯一士抱不平，而罵那瞎捧他的人道：『你們不了解我的好友，你們也不會了解我的！』」<sup>51</sup>此處顯然將矛頭指向胡適。正因如此，賀麟大力引介魯一士的思想，不但親自翻譯了魯一士的《黑格爾學述》，並鼓勵好友謝幼偉翻譯《忠之哲學》、他的學生樊星南翻譯《近代哲學的精神》。<sup>52</sup>其實《忠之哲學》不但有謝幼偉的譯本，早在1936年楊績也曾翻譯此書，稱為《忠的哲學》。<sup>53</sup>在1930-1940年代，學者們熱中於將魯一士的《忠之

<sup>48</sup> 此一序言寫於1942年6月19日，地點在貴州遵義。見謝幼偉，〈譯序〉，《忠之哲學》，頁1-2。

<sup>49</sup> 賀麟，〈譯序〉，《黑格爾學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3。在當時美國哲學界，魯一士是否有與詹姆士相當的聲望，仍值得進一步研究。以今日哲學史的標準來看，很多人可能會懷疑賀麟抬高了魯一士的地位，以便與胡適對抗。

<sup>50</sup> 胡適，〈實驗主義〉，收入氏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1，頁277-323。本文原刊於《新青年》，卷6期4（1919）。

<sup>51</sup> 賀麟，〈譯序〉，《黑格爾學述》，頁3。

<sup>52</sup> 該書是：《The Spirit of Modern Philosophy》。賀麟所譯的《黑格爾學述》的第一章，即譯自該書。見賀麟，〈譯序〉，《黑格爾學述》，頁31。

<sup>53</sup> 魯一士是謝幼偉的翻譯，楊績將之譯為洛依思。楊績在序言裡對作者有一簡單介紹。見約西亞·洛依思(Josiah Royce)原著，楊績譯，〈譯者序〉，《忠的哲學》（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楊績(1905-1957)原名楊剛，燕京大學畢業，為著名的女記者。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曾翻譯許多書籍，如赫刻(Julius F. Hecker)的《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尼布耳(Reinhold Niebuhr)的《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奧斯登(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等。楊績後來在反右運動中自殺。根據謝幼偉所述，他翻譯到一半才發現楊績的譯本，在比對之後他覺得「這書實有重譯的必要」，而且他深信「譯者這一譯本，實有楊譯所不及的」。參見謝幼偉，〈譯

哲學》引介到中國絕非偶然，而是與抗戰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主義崇拜」的觀念密切相關，<sup>54</sup>更與蔣介石所希望宣揚的類似日本武士道的立國精神相配合。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在楊績與謝幼偉的兩個中譯本都將下面有關「忠」的定義中的 *cause*（原因、理由）一字翻譯為「主義」。<sup>55</sup>魯一士的原文是：

Loyalty shall mean, according to this preliminary definition: The willing and practical and thoroughgoing devotion of a person to a cause.<sup>56</sup>

楊績的翻譯是：

依這初步的定義，一個人用一腔心願的，實際的，而且徹底的專忱對待一種主義，那便是忠。<sup>57</sup>

謝幼偉的翻譯是：

依照這初步的界說，所謂忠者，就是：一人對一主義之自願的，實際的，及徹底的盡心。（譯者按：英文 *Cause* 一字不易譯，茲姑譯為主義）。<sup>58</sup>

英文 *cause* 是原因、理由、緣由、目標等，然兩位譯者都譯為清末自日本傳入的「主義」一詞，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sup>59</sup>楊績在〈譯者序〉中將忠與「主義崇拜」的關係說得十分清楚，「人應該找到一個對自己獨立，又比自己更偉大

---

序〉，《忠之哲學》，頁 2。

54 「主義崇拜」是王汎森對近代思想史中一個重要現象的描寫，意指「許多思想家稱頌『主義』的神妙作用，傅斯年甚至說有主義總比沒有主義好。……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想用一套『主義』來指導思想學術的發展。」參見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463-488。胡適所說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正是對此現象的批判，胡適，〈問題與主義〉（1919），《胡適全集》，卷 1，頁 324-359。

55 賀麟在介紹魯一士思想時，將此一觀念譯為「志業」，他說：「忠忱即是對於某一志業的鞠躬盡瘁。」此一譯語要較「主義」為佳。見賀麟，《現代西方哲學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171。

56 Josiah Royce, *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p. 16-17.

57 洛依思原著，楊績譯，《忠的哲學》，頁 8。

58 魯一士著，謝幼偉譯，《忠之哲學》，頁 8。

59 「主義」一語可能是在 1890 年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中最早出現，是日文翻譯英文的“-ism”。參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 351。汪榮寶、葉瀾編的《新爾雅》（上海：明權社，1903）對「主義」的解釋是：「決定意思之實行，標明一種之方針者，謂之主義」，頁 56。

的社會目標以爲自己忠誠的對象。……人的生活須服從於一種從外而來的超乎自己的主義，以之爲自己的指南針。」他指出，中國人如不忠於主義、完成社會目標，將導致民族淪亡。<sup>60</sup>楊續也看到魯一士的觀念與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有所不同，是將忠誠奠基於「絕對觀念論」之上：「洛依思（案：即魯一士）不像實用主義者，要在每一行爲之感官結果中尋找真理的現金。他把真理的現金存在於那超人的精神的真實裡面。」<sup>61</sup>謝幼偉有完全相同的看法（有趣的是楊續是左傾，謝幼偉則是右傾），他在該書的〈譯者導論〉中說：

忠必有忠之對象，也就是主義。沒有主義，必無由盡其忠。有了主義之後，則必願意的，及徹底的，盡心於此主義。然即此仍不能認爲是忠，因我的盡心可徒托空言。所以我的盡心，必表現於實際的行為而後可。如烈士之殉國，教徒之殉教，船長之殉船，都是忠的好例。忠不僅是一種情感。雖盡忠之人，必有情感，然其情感必受制於其主義。以主義節制其情感，一切均惟主義之命是聽，即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其於主義也，雖必喜之愛之，然所以喜之愛之者，決非為個人的利益或快樂，而是相信主義有其自身之價值，可離個人之利益而獨立。盡忠之人，所以願為主義死者，其故在此。<sup>62</sup>

由此可見，賀麟之所以能向蔣介石爭取到經費，與他個人哲學上的企圖，亦即引介魯一士思想來打擊胡適所代表的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並呼應蔣介石的效忠主義、抗戰建國的想法直接相關。<sup>63</sup>關於這一點，他在〈兩點批判〉，

<sup>60</sup> 楊續，〈譯者序〉，《忠的哲學》，頁 5-7。值得注意的是，楊續後來加入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換言之，她翻譯此書的目的應與賀麟、謝幼偉介紹此書以捧蔣的政治目的不同，但均出於「主義崇拜」。她在〈譯者序〉中說：「這本書值得介紹的地方是它對於忠誠的這個意思作了有力的闡發，它的弱點是它沒有告訴我們去尋求應當忠誠的對象。」同上，頁 13。

<sup>61</sup> 洛依思原著，楊續譯，《忠的哲學》，頁 8。

<sup>62</sup> 謝幼偉，〈譯者導論〉，《忠的哲學》，頁 14。

<sup>63</sup> 賀麟對胡適與實驗主義的系統批判，參見《當代中國哲學》，頁 69-72。他說：「由於實驗主義者重行輕知，重近功忽遠效，重功利輕道義，故其在理論上乏堅實的系統，在主義上無確定的信仰。……故不論在政治方面，理論方面，都不能滿足青年精神生活的要求。」頁 72。胡適並未直接回應賀麟，不過早在 1925 年 8 月 13 日，他寫《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時，對當代思想中「陸王學」的傾向，以「揣度影響之談來自欺欺人」，偏離了「科學的致知窮理的中國哲



一點反省〉有所剖析，他也承認這樣的哲學工作是爲了「以適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統治階級的需要」：

在解放前的學術思想方面我和胡適曾有過唯心論內部派系間的矛盾，……他販運杜威的實用主義，我販運反動的神秘化黑格爾哲學的新黑格爾主義。……他把杜威實用主義的方法與清代漢學家的治學方法相結合，我把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裡販來的神秘化直覺化的黑格爾唯心辯證法與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宋儒的直覺內省方法相結合，……最終目的我和胡適並無不同。不唯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目的相同，而且一方面依靠西洋資本主義社會某一派的唯心論，一方面希圖復活中國封建社會某一派唯心論，兩相調和附會，來一個「中西合璧」，以適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統治階級的需要。<sup>64</sup>

他更說其實這就是爲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服務」：

我曾經要求把儒家思想更宗教化，以便更好為蔣介石所御用的舊三民主義作「哲學」基礎，以抵制馬克斯主義哲學，……尤其反動的是因為蔣介石也喜歡一種神秘唯心的辯證法，我還很無恥地迎合他的意旨，企圖用唯心辯證法正反合的公式來闡述舊三民主義以反抗共產主義。……我用唯心論辯證法直接去為舊三民主義辯護，直接為蔣匪的法西斯統治服務，也到了公開無恥、瀆褻哲學和辯證法的程度。<sup>65</sup>

上文可以顯示 1949 年之後賀麟將自己與胡適相提並論，說成都是爲統治階級——蔣介石來服務。上述的觀點雖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所發的議論，然由此可見 1945 年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中大力捧蔣，與 1938 年之後他與國民黨人及蔣介石的交往，以及蔣對他的籠絡、重用，應有一定的關係。一直到 1947 年，當《文化與人生》在上海出版時，賀麟還請他的學生將該書寄贈國民黨政

---

學」表示不滿。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140。

<sup>64</sup>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 年 1 月 29 日。

<sup>65</sup>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 年 1 月 29 日。這兩段文字在《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均被刪除。這很可能是因為賀麟也難以忍受當時竟用這種文字來污辱自己。



要，包括蔣介石、陳立夫、陳果夫、陳布雷等人。<sup>66</sup>以上敘述了從賀麟的角度所看到的賀蔣關係，那麼蔣介石是如何看待賀麟呢？蔣檔中透露出一些消息。

### 三、蔣賀交往：蔣檔中的蔣賀關係

我所調閱的蔣檔是目前藏於國史館的未刊檔案（亦稱大溪檔案），主要是〈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文物：學記初稿〉、〈蔣中正總統文物：愛記初稿〉，以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登記卷〉，此外也核對了藏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sup>67</sup>其中有關賀麟的資料並不多，但可以補充上一節所述一般文獻中的賀蔣關係。茲分以下數點說明。

首先，蔣檔中有關 1940-1948 年間蔣賀見面的紀錄只有兩次，都在 1941 年初，而非彭華所說的四次。<sup>68</sup>這兩次分別是〈日記〉與〈事略稿本〉所記：1941 年 1 月 15 日，蔣介石「正午與賀麟談哲學。」<sup>69</sup>以及 1941 年 2 月 11 日蔣介石「與賀麟談《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彼頗有見地」、「下午會客，校閱賀麟著《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sup>70</sup>至於以後究竟是另外見過兩次面（如賀麟說 1942 年曾與蔣見面），而蔣未留紀錄，還是不曾見面，不得而知。

其次，為何蔣在 1941 年初要兩度接見賀麟？如果梳理〈日記〉與〈學記初稿〉可以透露出一些思想上的線索。蔣在 1930 年 10 月 23 日於上海受洗，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後，即對於宗教、哲學方面的探討有濃厚的興趣。<sup>71</sup>1938-1941 年

<sup>66</sup> 汪子嵩，〈讀《文化與人生》——紀念賀麟先生百年誕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研究室編，《賀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21。

<sup>67</sup> 筆者感謝張力教授協助查閱藏於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以下略收藏機構）。

<sup>68</sup> 彭華的〈賀麟年譜新編〉中記載：「從賀麟回國至 1948 年，蔣介石曾經 4 次約見賀麟」，不過他的文章並沒有談到其他三次見面的情況。《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第 1 期，頁 82。

<sup>69</sup>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100148015。

<sup>70</sup> 〈蔣中正總統文物：愛記初稿〉，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200017011；〈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100149011；〈蔣介石日記：1941 年 2 月 11 日〉。〈日記〉與〈事略稿本〉之文字相同，只是〈事略稿本〉將〈日記〉中的「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中的「徵」字改爲「證」。

<sup>71</sup>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卷 2，頁 76；Bae Kyoungan, "Chiang Kai-shek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Life Reflected from His

間，他對黑格爾辯證法等宗教、哲學議題，以及中西哲學會通等頗為著迷。<sup>72</sup>他召見馮友蘭談中國哲學，與賀麟會面談黑格爾與辯證法，約略都在此一時期。<sup>73</sup>

1941年的1月1日，〈學記〉中有一段討論「道體」的話：「看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道之本原，是整個完善無缺的。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少離。道體即在我心，我即為宇宙萬物之中心。若萬物一離本原，即偏頗零殘，不得其正，就要互相衝突，成為矛盾，則物不能美善了。□人生直求道體，乃可發現真理，萬事皆成為完善至美焉。」<sup>74</sup>

1941年1月3日又記：「看黑格爾與朱子太極解之比較說。曰重複研究，覺更有心得。」這一條史料很重要，應該是蔣約見賀麟的契機。因為蔣所閱讀的這一篇文章正是賀麟的作品，收入《黑格爾學述》附錄一的〈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之比較觀〉。1939年，賀麟曾託陳果夫送給蔣介石這一本書。蔣讀過好幾次，才會說：「重複研究，覺更有心得。」隔天，即1月4日（而非上節所說的1940年底）他就打算約見賀麟：「約賀麟講黑格爾哲學，又約人講解文藝復興史。」<sup>75</sup>幾天之後，蔣介石又記錄了閱讀賀麟著作的心得：「看黑格爾與朱子太極解之比較說完，記曰：余甚想於此再加闡明，思於中西太極哲學，有所擇，以期貫通。但願天能再假我二十之年耳。」<sup>76</sup>接下來幾乎每天，蔣介石心中都在思考與此相關的哲學議題，直到與賀麟見面的1月15日：

十二日，記曰：「世界之中，尚有無限的真理，未曾見，即未能致用

---

Diar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1 (June 2009), pp. 1-10.

<sup>72</sup> 王奇生指出，1938年底蔣開始讀黑格爾辯證法，此一閱讀興趣前後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在1938年12月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寫到：「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1940年12月18日，又寫到：「昨夜因晚餐後研究黑格爾哲學太遲，故又失眠不寧，今晨八時後方起床。」王奇生，〈蔣介石的閱讀史——以1920-1940年代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探討〉，頁418。

<sup>73</sup> 有關馮友蘭在1940年代「為高官講學」，見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頁159-160。

<sup>74</sup> 〈蔣中正總統文物：學記初稿（二）〉，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200012006。

<sup>75</sup> 〈蔣中正總統文物：學記初稿（二）〉，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200012006。〈蔣介石日記〉中在一月初有兩次蔣想約見賀麟的紀錄：1941年1月6日「預定一約賀麟談話」；1941年1月11日「預定……二約孟餘賀麟來談」。

<sup>76</sup> 〈蔣介石日記〉的文字略有不同：1941年1月8日：「昨日看賀著朱子與黑格爾太極比較說完，略有心得，甚想於此再加闡明，思於中西太極哲學有所發揮，以期貫通，但願天能再假我二十之年耳。」

的力量。我們要得包藏在這些真理和能力中的幸福，除了對信仰冒險的前進，沒有其他方法了。」又記曰：「反省去年對於真我之根源，與太極之內容，自覺略有領會。而人生對於宗教信仰之關係，使我內心漸能昇華，惜尚未深入於自得之域耳。此於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義》、<sup>77</sup>魯一士所著之《黑格爾學述》二書，實助我宗教與哲學之研究，其功奇大也。」

十三日，記曰：「朱子太極為主敬克己，存心養天；黑氏太極為致信克敵，盡心立命。」

十四日，記曰：「信仰就在於力行」，力行亦是真正的信仰。

十五日，聽賀麟講哲學。

甚至到與賀麟見過面的1月17日，蔣寫到：

回憶去年，余本身進步，以宗教之信仰與哲學之心得為最大。余之性情，本以哲學最近，然雖至此五十以上之年齡，恐亦不能深信至此。又記曰：「近日對於哲學與宗教之研究，幾乎朝夕不倦，每至午夜，不忍釋卷。」

1月31日，〈學記〉中還看到：「三十一日，察覺黑格爾所稱矛盾道理即中國陰陽太極」。2月3日，蔣又提到黑格爾，並將黑格爾的觀念用來解析人生中善惡、靈肉之衝突：「黑格爾說：對於寵愛的見解，往往有好壞兩種相反的結果，因為人的靈魂且有善惡二者之衝突，吾人生活之善惡與命運之好壞，均以此二性衝突之勝負如何而定。愛一方面可以說是破滅靈魂的癡狂；但一方面又可以說愛是神聖的感情，或神聖的癡狂，可以使吾人自如其真的命運。所以在此兩說的衝突，就是道德生活的衝突，和靈肉戰爭的抽象的寫照。」

5月31日，蔣又談到黑格爾：「三十一日，晨記曰：黑格爾矛盾之理，即中國陰陽之道，黑格爾所謂絕對存在與絕對本源，即中國太極咸具萬理之理

---

<sup>77</sup> 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撰，胡貽穀譯，《信仰的意義》(*Meaning of Faith*) (上海：青年協會，1929)。

也；至其所謂絕對無窮者，即理一而分殊，亦即具千理而應萬事之謂也。故黑氏哲學，余最能心領而喜觀者。」其中透露出蔣對黑格爾哲學中「絕對觀念」的體會與喜好，並說此即中國的「太極」與「陰陽之道」。這些想法無疑地都是得自賀麟著作之啓發。

總之，從以上〈學記〉所述，可知蔣在當時醉心於哲學、宗教，又讀過賀麟的書，才因此而電召賀麟至重慶見面。至於 2 月 11 日〈事略稿本〉記載「下午會客，校閱賀麟著《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因為《三民主義辯證法大綱》一書尚未找到，我推測可能只是賀麟寫的有關三民主義的稿本，嘗試以辯證法來闡釋三民主義，並對抗「辯證法唯物論」。不過從蔣所說「彼頗有見地」的評語，可見蔣對他的觀點仍然十分欣賞。<sup>78</sup>

再其次，蔣檔中有一份關於賀麟的人事資料，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蔣賀（或說賀麟與國民黨）的關係。這一份資料是賀麟在蔣介石侍從室所留下的人事資料。有關侍從室第三處在 1939-1945 年間所做的人事調查，馮啓宏做過深入的分析。此一報告的主要目的在於考察各級人員之品德、能力，以判斷其是否適才適任；其次則是爲了儲備抗戰建國之人才。<sup>79</sup>賀麟的人事資料計分爲兩個部份：一是 1941、1943 年賀麟兩次所自行填報的「人才調查表」，其中 1941 年的部份與上述賀麟加入國民黨的時間接近；另一部份則是 1946 年爲了「國民大會代表案」所做的調查，當時賀麟被提名爲教育團體的代表，不過後來他並未當選：<sup>80</sup>

<sup>78</sup> 「三民主義辯證法」的觀念一直爲蔣介石所牢記於心，1951 年 2 月 8 日，他在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八十二次會議時對此曾有所指示。他說：「中央改造委員會對匪黨之《辯證法》、《中共幹部教育》、《中共工作領導及黨的建立》、《中共整風運動》等，應即行切實研究——以上四種書籍，想必各位同志多已看過，但看了不算，必須集體研究，作成具體結論，纔能發生作用。關於辯證法一項，尤應澈底研究和切實學習，並從速編輯本黨適用的三民主義辯證法，引用總理遺教來證明辯證法的原則，作爲黨員思想和方法的指導。」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10，頁 40。

<sup>79</sup> 馮啓宏，〈花谿論英雄：侍從室第三處的人事工作析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7（2007 年 9 月），頁 119-164。

<sup>80</sup> 有關該次國大代表選舉，參見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165-205。

人才調查表（賀麟填於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服務經歷

清華大學講師  
北京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  
中央政治學校借聘教授一年

現任職務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中央政校教授  
戰後建設問題研究會名譽理事  
三民主義青年團部評議會評議員（一屆）  
有經驗或專長之同學或同業  
趙錫麟（理財專長）

人事登記補充片（民國三十二年）

經歷

中央團部二屆評議員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國大本黨遴選代表  
憲政實施促進會常委  
國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  
國大一屆教育團體北區後補代表

調查表

案由：國民大會代表案

調查人：〔果〕汝煌

調查報告：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賀麟 現任國民黨代表

惇惇儒雅，潛思為學，對黑格爾、尼采哲學有研究。言論行動當見純

正，醉心個人自由主義學說，但對本黨為當忠實。<sup>81</sup>

從上述的人事報告可以看得出來，對國民黨人來說，賀麟無疑地是「本黨忠實同志」。另一個證據是 1945 年 5 月 5 日，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陳立夫與朱家驊聯名向蔣介石推薦 98 名最優秀教授、黨員，其中包括黎錦熙（西北師範學院），陳寅恪（燕京大學），伍蠡甫（復旦大學），熊慶來（雲南大學），薩本棟（廈門大學），金毓黻（東北大學），竺可楨（浙江大學），王星拱、朱光潛（均武漢大學），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馮友蘭、賀麟、華羅庚、姚從吾（均西南聯大）等。<sup>82</sup>賀麟的名字也名列其中。

顯然是因賀麟為忠實又優秀的國民黨員，1949 年山河變色之前，他是蔣介石所要營救、保護的對象之一。這是蔣檔中有關賀麟的最後一條資料。1948 年 12 月 17 日，蔣介石發電報給傅作義(1895-1974)，要傅幫忙安排幫助蔣所指定的 62 名學者搭飛機到南京，準備撤退北平，名單中包括賀麟，電文的詳細內容如下：

北平傅總司令宜生兄，口密。（一）在乎教育行政負責人為：「梅貽琦」、「李書華」、「袁同禮」、「袁敦禮」、李麟玉、陳垣、「胡先驌」、「湯用彤」、「馮友蘭」、葉企孫、饒毓泰、陳岱孫、「鄭天挺」、「賀麟」、鄭華熾、沈履、霍秉權、褚士荃、黎錦熙、溫廣漢、黃金鰲、徐悲鴻。（二）因政治關係必須離平者為：「朱光潛」、「毛子水」、「邱椿」、「張頤」、「陳友松」、劉思職、「梅貽寶」、齊思和、雷宗海〔案：應為雷海宗〕、劉崇鋮、戴世光、邵循恪、吳澤霖、趙鳳喈、敦福堂、張恆、金澍榮、「英千里」、張漢民、徐侍峰。（三）在乎之中央研究院士為：「許寶騷」、張景鉞、陳達、戴芳瀾、「俞大綬」、李宗恩。（四）學術上有地位，自願南來者，如「楊振聲」、羅常培、錢思亮、馬祖聖、趙迺搏、錢三強、嚴濟慈、張政烺、沈從文、

<sup>81</sup> 〈侍從室人事登記卷：賀麟〉，國史館藏，檔號：129000019327A。

<sup>82</sup> 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14151008。筆者感謝王奇生教授提供此則史料。



邵循正、鄧廣銘、李輯祥、孫毓棠、蒯淑平。請兄分別疏導，即日南移，如獲彼等全意□□□，可派機或備船接運。其搭機人員並請兄代排訂次序電告，尤以有括弧者，務須來京，如何？請速電覆中。<sup>83</sup>

賀麟的名字列在「在平教育行政負責人」，且加上了引號（文中稱為「括弧」），是優先搶救的人選之一，不過誠如上述，賀麟拒絕了蔣介石的安排，選擇留下來。爲什麼與國民黨和蔣介石關係那麼深厚的他，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呢？我們必須進一步從思想層面來挖掘其原因。

#### 四、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與蔣介石

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序文寫於 1945 年 8 月 30 日，地點在昆明，同年 11 月初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在序文中賀麟詳述了該書的緣起。這一本書其實一開始就與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該書的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是應潘公展(1895-1975)之邀而作，收入由潘公展主編、爲紀念中國國民黨五十週年而出版的《五十年來的中國》一書。<sup>84</sup>潘公展爲浙江吳縣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曾參加五四運動。1927 年 1 月，由陳果夫推薦加入中國國民黨，爲 CC 系的核心成員。<sup>85</sup>同年 4 月，任上海政治分會委員。7 月，任上海特別市政府農工商局長。1932 年 8 月，任上海市教育局長兼社會局長。自 1928 年 2 月起，一直擔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並出席了國民黨第三、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35 年 11 月，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此期間，還在上海創辦《晨報》。此外，他還辦過《晨報晚刊》、《兒童晨報》、《兒童畫報》等。1934 年 3 月，設

<sup>83</sup> 〈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七四）〉，國史館藏：檔號：002090300197213，1948-12-17。有關這 62 人的生平經歷與 1949 年的抉擇，請見本文附表。

<sup>84</sup> 潘公展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重慶：勝利出版社，1945）。據潘公展所寫的序文，該書作者均爲與國民黨關係深厚的「身歷革命的先進作家與各種問題的專門學者」，如鄒魯、王龍惠、徐培根、翁文灝、陳立夫、王雲五、任鴻雋、李晨冬等。見頁 5。

<sup>85</sup> 潘公展與 CC 系的關係，請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 231、334。

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任常務理事兼書記長。不久，出任上海特別市教育局長。抗日戰爭時期，潘公展先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漢口開辦的獨立出版社經理、湖南省政府秘書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後又兼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副局長、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主任。1942年11月，在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再改任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年5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上，再次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並任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sup>86</sup>由以上的經歷，可見潘公展是國民黨宣傳部門的一位重要人物。

潘公展的文化事業與位於重慶的勝利出版社發行人印維廉也有關係。兩人在抗戰期間為弘揚與振奮民族精神，曾編輯「民族偉人故事集」、「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等叢書，邀約錢穆寫《黃帝》，又邀約學者寫管仲（王毓瑚，1945）、秦始皇帝（顧頡剛，1946）、諸葛亮（祝秀俠，1944）、岳飛（鄧廣銘，1945）、明太祖（吳晗）等書。在賀麟的〈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刊出之後，他說：「蓋因此篇未能寫完方承公展先生及印維廉先生的好意，提議並再三催促我寫完此文，另刊單行本。」<sup>87</sup>因此潘公展與印維廉的約稿是賀麟從單篇文章擴大，寫成一本專書的緣由。

該書的第二章〈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是專為單行本所寫。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判〉則是樊星南為賀麟所做的演講紀錄，曾在《文化先鋒》上刊載過。該期刊也是國民黨的一個宣傳刊物，由重慶的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發行，出版時間為1942-1948年，發行人是該會的主任委員張道藩(1897-1968)，主編李辰冬（1907-1983，該會委員兼秘書）、編輯徐文珊(1900-?)。<sup>88</sup>張道藩

<sup>86</sup> 潘公展的生平見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頁560-561，及潘公展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潘公展先生紀念集》（台北：華岡印刷場，1977）。

<sup>87</sup>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頁4。

<sup>88</sup> 徐文珊，河北遵化縣人。1929年考入燕京大學文學系，畢業後在北平匯文中學做國文、歷史教師。抗戰時擔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兼編譯科長；1945年9月，擔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徵集處長，國史館和黨史館聯合辦事處主任；1949年9月，隨國民黨中央黨史

曾留學英、法，研習美術、文學與藝術。1922年由邵元冲(1890-1936)介紹在倫敦加入國民黨，後來成為國民政府文化事業與政治宣傳的重要策劃者，也是CC系的骨幹人物。<sup>89</sup>抗戰期間，他先在武漢成立「中國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繼而在重慶出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公展任副主任委員），該會標榜「以文化力量增強抗戰力量，以文化建設促進國家建設」。上述的《文化先鋒》，以及《文藝先鋒》兩刊物就是在此一階段刊行的。<sup>90</sup>賀麟在此一刊物上發表文章，足以顯示他與國民黨宣傳部門的密切關係。

該書的第四章〈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曾分五篇發表在李惟果(1905-?)所主持的《三民主義週刊》(1941-1942)之上，1943年12月曾由重慶的青年書店以《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為名出版。賀麟說：「此五篇文字之寫成，應該感謝惟果兄函電催促之力。」（頁4-5）李惟果為貴州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公費留美，獲柏克萊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歷任蔣介石秘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行政院秘書長(1948)等職。他與鄭彥棻、胡軌等人在國民黨內屬蔣經國的「太子黨」、「贛南派」。李此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他自1939年9月被任命為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後，可隨時去電蔣經國（時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江西支團籌備主任），告知蔣介石的意向和黨團中央的動態，蔣經國亦時常透過李來轉達他的情況和要求。《三民主義週刊》是1940年蔣介石交待陳布雷所辦的一個刊物，以弘揚三民主義理論，領導青年思想為目標，部份則是針對中共在重慶辦的《新華日報》。1941年1月《三民主義週刊》在重慶創刊，由三民主義周刊社編輯發行，1942年7月1日改為半月刊，兩者的封面均由吳敬恆題字。

---

委員會選台，並繼續在中央黨史委員會內任職。歷任東海大學兼職教授、中國醫藥學院等校客座教授，退休後改兼任教授，亦為著名的書法家。

<sup>89</sup> 邵元冲早年曾加入同盟會、中華革命黨。1919年赴美留學，並奉孫中山之命，視察海外黨務，周遊美、英、法、德諸國，張道藩即在此一階段為其吸收入黨。邵之生平與經歷，請參見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頁487-488。

<sup>90</sup> 楚崧秋，〈張道藩先生與中國文藝〉，收入道藩文藝中心主編，《張道藩先生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頁18；張道藩，〈我怎樣的參加中國國民黨〉，《張道藩先生文集》，頁54-55。

《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有一個很清楚的思路：以當代「陸王學」的復興作為發展主軸。用他的話來說，近五十年來中國哲學乃「如何由粗疏狂誕的陸、王之學，進而為精密系統的陸、王之學，如何由反荀反程、朱的陸、王之學進而為程、朱、陸、王得一貫通調解的理學或心學。」（頁 19，為避免繁瑣，以下在引文之後標明頁數，不另加註）至於造成陸王學盛大發揚的原因，賀麟認為主要是與個人自覺、民族自覺相契合，也配合過渡時代，「無舊傳統可以遵循，無外來標準可資模擬」，故反求內心之所安，以應付瞬息萬變之環境（頁 19）。依此賀麟清理出了從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再到馬一浮的一條現代「陸王學」的思想系譜。

孫中山與蔣介石則被歸為本陸王之學而發為事功的代表人物，並對知行關係提出詮釋，因而對中國哲學有重要的貢獻。對於孫中山，他指出「知難行易說」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互相發明。同時從知難行易說推演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兩原則，使其學說「富於近代精神」，對於恢復民族自信心，促進民族意識的自覺，貢獻很大（頁 20）。對於蔣介石，賀麟認為他的事功是基於哲學修養，「他責己之嚴，治事之勤，革命之精誠，事業之偉大，皆由於精誠致良知之學問得來」（頁 21）。再者，在哲學方面，蔣介石的貢獻是「把握住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真義」（頁 115），「蔣先生『不行不能知』之說，對於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之說的發揮與補充」（頁 115）、「灼然見得王陽明知行合一說及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貫通契合處，而發揮出他的『行的道理』」（頁 21）。換言之，蔣介石和賀麟一樣，都看到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是不相矛盾的。同時蔣的「力行哲學」將行說成是「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他的行包含了仁與誠，亦即仁民愛物而真純專一。賀麟的結論是：「蔣先生所講的哲學，乃即是他自己偉大人格的寫照，堅苦革命經驗的自白。……蔣先生的哲學特別值得我們了解，因為了解他的哲學，即是了解他的人格何以偉大，了解他革命偉業的精神背影，也即是了解他抵抗暴日的精神戰略，並且了解我們抗戰何以必勝，建國何以必成的理論基礎。」（頁 132-133）

賀麟明白地指出，蔣介石和德國大哲學家費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之所見「若合符節」，「深切著明地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須要建築在一個偉大的民族哲學和民族精神復興的運動上面」（頁 130）。

《當代中國哲學》一書的最後，附了一篇賀麟的好友謝幼偉所寫的〈抗戰七年來之哲學〉，原文發表於 1944 年《文化先鋒》第 3 卷第 24 期，後收入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的文化運動叢書《中國戰時學術》(1946)，由孫本文等編、正中書局出版，篇首有張道藩寫的序文。在這一篇附錄之中，謝幼偉呼應了賀麟的主張，將蔣介石在 1939 年 3 月 15 日的一篇有關「行的哲學」的演講，譽之為「抗戰七年來，中國哲學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並說：「蔣主席提倡力行哲學可謂有根據，有淵源，而決不是杜撰的。」（頁 147-148）對於賀麟闡述蔣介石的理論，他也大力讚許，認為賀著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對力行哲學確有認識，確有發揮……賀先生這種解釋，可謂得到了力行哲學的真意。」（頁 148-149）

1949 年，《當代中國哲學》出版之後的四年，賀麟面臨了要留在大陸，接受中共政權，還是隨蔣介石政權南遷的抉擇。這一段經歷賀麟在〈我和胡適的交往〉，原載《文史資料選編》第 28 輯(1986)中有所說明：

1949 年北平臨解放前，清華校長梅貽琦到胡適家來，兩人商量的出走的事。不久，兩人就先後飛往南京去了。……我不知道共產黨地下組織是否已經勸告胡適、梅貽琦不要走，但我自己是有這個經歷的。一個叫汪子嵩的學生曾經代表地下黨組織找我，勸我留在北大，不要到南京去。我當時的回答是：「我沒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謝謝你們。」不過我是動了心的。據說，當時北大地下黨負責人王漢斌要汪子嵩別暴露黨員身份，以防意外。汪說：「不要緊，我相信他不會給警備司令部打電話，叫人來抓我的。」也有人勸我以走為好。但我想，我又不幹壞事不犯罪，幹嗎要走呢？而且這麼多書怎麼帶走呢？我也懂點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黨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可怕，知道共產黨也



還需要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在這期間，有四次機會我可以飛南京，我都沒有走。經過反復考慮和思想鬥爭，我終於留下來了。<sup>91</sup>

上述的自白，尤其是所謂「我又不幹壞事不犯罪，幹嗎要走呢？而且這麼多書怎麼帶走呢？」大概是賀麟選擇留在大陸的重要原因。此外，對蔣介石缺乏信心可能也很重要。據張祥龍所述，1948年陳布雷的自殺，對他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據說賀麟在聽到陳的死訊之後，一方面發現陳的兒女竟是共產黨員，也感覺到親近蔣介石往往沒有好下場，曾說：「陳布雷死後，我對蔣介石更加失望，他竟這樣對待自己的左右……」，因而選擇了留在中國大陸。<sup>92</sup>

1949年之後，賀麟很少公開地批判蔣介石，只有在1950年代批胡運動期間提到：解放後不久，他因為閱讀艾思奇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1943)，幫助他「在思想上與蔣介石的反動思想劃清界限」。<sup>93</sup>此外，就是批胡期間說過一些較重的話。賀麟後來多採取間接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當年捧蔣的不當。1986年，賀麟將早年的舊作《當代中國哲學》改名為《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交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寫的序言中，賀麟特別說明：「上篇中第一第二兩章除個別字句稍有修訂外，……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係基於學生的筆記寫成，由於我當時對於辯證唯物論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sup>94</sup>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比對1945年的《當代中國哲學》與1986年的《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會發現兩者無論在結構、遣詞用字、歷史論斷等，都有很重大的差異，有許多的增刪。這些調整，賀麟在序言中並沒有清楚地交代。茲說明如下。

<sup>91</sup> 轉引自汪子嵩，〈往事舊友 欲說還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2/24/content\\_132890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2/24/content_1328905.htm) (2009/9/7)。亦參見汪子嵩，〈讀《文化與人生》——紀念賀麟先生百年誕辰〉，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研究室編，《賀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26。

<sup>92</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73。

<sup>93</sup> 賀麟，《現代西方哲學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227。

<sup>94</sup> 賀麟，〈新版序〉，《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頁2。



第一，凡是 1945 年版中所有有關國民黨、三民主義與蔣介石的部份在新版中都被刪除。例如在《當代中國哲學》原序中有關潘公展、印維廉、李惟果等名字，以及《文化先鋒》、《三民主義週刊》等刊物，與附錄中謝幼偉的〈抗戰七年來之哲學〉都被刪除。又如第一章原為「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當今國府主席蔣先生，就是王學之發為事功的偉大代表」（頁 19），被改為「孫中山先生就是王學之發為事功的偉大代表」，「國父」、「與當今國府主席蔣先生」被刪除掉了。再者第一章中有四段關於蔣介石哲學的描寫，從「至於蔣先生則在他青年時期，……我敢斷言，沒有人會否認蔣先生對陽明之學實有親切精闢的發揮，且於事功方面發揮出偉大的效用」（頁 20-22）被刪。又如新版第三章對於孫中山的肯定打了折扣，本來是「我個人看來，這派哲學將要大大發展的」（頁 69），新版改為「在我個人看來，這派哲學將會有較大發展的」；而且這一段文中的「三民主義」被改為「孫文學說」（頁 64）。第三章第四節標題原為「正統哲學與三民主義哲學的展望」，新版中被改為「古典哲學的新展望」，且文中有關三民主義的部份均被刪除（頁 74-76）。再者，舊版第四章之中凡是涉及蔣介石的部份均被刪除，如「蔣先生提出『力行』之概念，實把握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的真義」、「對於這個問題，蔣先生亦有一切實周至而又符合中山先生本旨的貢獻。……」（頁 115-117）。最後，第五節「知難行易說與力行哲學」一節完全被刪掉（頁 128-142）。

第二，賀麟更動了對部份哲學家的評價。如胡適的〈說儒〉一文，原為較正面的，「這篇文章的態度似較客觀，復引起許多有唯物史觀興趣的人，從職業或出身方面去解釋孔、老、墨的異同」（頁 23），改為較負面的「這篇文章似又退回到尊孔態度，並且引起有些人誤認為從職業或出身方面去解釋孔、老、墨的異同，就算是唯物史觀。」（頁 21）馮友蘭的部份，新版增加了「他自稱他自己所謂《新理學》為『最哲學的哲學』，也沒有人承認他這種吹噓」（頁 21）；「我們也無法採取他自己認他的『新統』是『最哲學的哲學』的

評估」（頁 33，其中「是『最哲學的哲學』」為舊版所無）。<sup>95</sup>

第三，賀麟改變了對「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與以往的負面評價。這主要是第三章第三節的部份。舊版是「辯證法唯物論批判」，新版改為「辯證唯物論的剖析」。再者，文中對辯證唯物論的負面性字眼都被刪除，如「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想的貧乏」（頁 76），改為「以上種種說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方法論，許多都是承繼黑格爾而來」（頁 71）。其他的例子如「唯物史觀的錯誤，就像這例中以爲鐘錶決定了人的行爲一樣」（頁 78）、「辯證法唯物論的根本缺點是忽略個性，忽略人格，將人與人的差別完全抹煞，……」（頁 79）等句子均被刪除。

第四，賀麟將孫、蔣的繼承關係，依照共產黨的觀點，改變為孫中山與毛澤東的繼承關係。新版將孫中山的知行說定位為「代表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對這個問題最高最新最進步的成就，也爲他後來提出『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準備了條件。」（頁 207）同時將思想系譜連接到毛澤東的《實踐論》，作為知行哲學歷史發展的最後階段，「代表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實踐論，……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哲學工作者一個很好的指南。」（頁 207-209）賀麟在 1986 年所做的思想系譜的變動，亦即砍斷孫中山與蔣介石的聯繫，而將孫直接與毛澤東連接在一起，其實是中共學界對知行問題的「欽定」觀點。1982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任教的方克立撰寫《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時，該書第八章〈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之後，也是以毛澤東思想作為總結，該書的結束語是「《實踐論》——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問題的科學總結」。<sup>96</sup>賀麟無疑地是跟隨著此一思想脈絡，投靠了毛澤東思想，而跟以前他所力捧的蔣介石哲學徹底決裂。

<sup>95</sup> 翟志成在他的書中引用了這一句話，卻沒有注意到文中「是『最哲學的哲學』」的字眼是 1986 年時加進去的。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頁 186。

<sup>96</sup> 方克立，《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五、結 論

以上我們很仔細地清理了抗戰期間的蔣賀關係，可以發現賀麟與蔣介石和國民黨關係之密切，超過我們以往的認知。蔣介石與賀麟的結合，是政治與文化上民族主義的結合，賀所宣傳的費希德式德國愛國主義、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以及魯一士對群體的重視與反駁詹姆士重視個性的實效主義與工具主義）、忠的重要，與他對儒家傳統的尊重，又以中國哲學觀念來詮釋西洋哲學等等，是他為蔣所欣賞、重用的主要原因。他左批唯物辯證法與共產主義、右批胡適的實驗主義與自由主義，並從哲學史的角度肯定蔣介石與孫中山的繼承關係。對蔣介石與國民黨黨務人員來說，賀麟的「忠誠度」是毋庸置疑的。

賀麟一生最讓人費解的是，為何在 1949 年他選擇留下來？以及為何在 1949 年之後他可以徹底地「洗澡」，在思想上與他以前所信仰的各種理念完全決裂，而全心全意地擁抱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誠如上述，他覺得自己沒做壞事，而且共產黨沒有那麼可怕，應該是留下來的主因。此外，1946-1949 年間的經歷，如陳布雷的自殺、國民黨處理「進步學生」的方式、<sup>97</sup>中共地下黨的鼓吹等，顯然都有一定的影響。謝詠所撰寫的〈晚年賀麟〉一文也一再感慨：「他們的轉變有多少是出自真誠，又有多少是出自無奈！」謝詠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他說賀麟、金岳霖與馮友蘭等哲學家都留了下來，「在西南聯大校史上，這 3 位哲學教授不僅留了下來，而且很快和新時代同步，倒是當年幾位治歷史的教授如陳寅恪、錢穆、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選擇，哲學家 and 史學家對立的選擇，給我們留下許多啓示。」<sup>98</sup>這一個解釋也不完全正確，因為離開大陸的哲學家也不少，如賀麟的好友謝幼偉、唐君毅，以及牟宗三等；同時留下來投共的史學家更不在少數。這樣一來，我們還是無法在思想內部找到必然的關連。不過在賀麟思想中，對於孫中山思想的推

<sup>97</sup>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頁 74。

<sup>98</sup> 謝詠，〈晚年賀麟〉，收入氏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頁 71。

崇倒是一生一以貫之的。再者，賀麟用力最深的西方哲學家，一是斯賓諾莎，一是黑格爾。這兩個人的思想都與馬克思血脈相連。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指出：「馬克思的哲學……源於西方人道主義的哲學傳統，這個傳統從斯賓諾莎開始，通過十八世紀法國和德國的啓蒙運動哲學家，一直延續至歌德與黑格爾，這個傳統的本質就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潛在才能得到實現的關懷。」<sup>99</sup>這樣一來賀麟的哲學傾向與馬克思主義有其配合之處。同時，作為一個本來信仰黑格爾思想的絕對唯心論者，他可能對於思想觀念所能發揮的力量抱有很樂觀的信念，他確信只要思想發生變化，就一定會帶來徹底的改變，這或許是為何賀麟「洗澡」會洗得那麼徹底的一個原因。換言之，唯心與唯物、擁蔣與擁毛雖然看起來像兩個極端，但以哲學來為政治服務的基調卻是完全一致的。無論如何，釐清賀麟與蔣和國民黨的關係，仍然無法幫助我們瞭解賀麟一生中這些讓人費解的問題，它只能顯示 1949 年離開或留居大陸的抉擇，對於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無比嚴峻的考驗。賀麟做出他自己的抉擇，也為他的抉擇付出代價。尤有甚者，從附表可見，當時蔣介石想極力營救的親國民黨或國民黨籍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沒來台灣（62 人之中，留在中國：43 人、赴台：7 人、海外：3 人、不明：9 人）。1949 年後，他們在大陸幾乎都經歷了與賀麟很類似的思想改造的慘痛過程。不在上述名單之內的周炳琳是一個完全相同的例子。他在 1948 年 12 月 14 日曾勸胡適搭機南行。<sup>100</sup>只是不知何故，他自己卻留了下來。1954 年 12 月 28 日，香港《大公報》登了一篇〈周炳琳駁海外奇談〉的講話紀錄。上面記載：「回溯卅年，到現在有了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治學處世方法。……聽說台灣友人中，流傳關於我在新安妥和自由的海外奇談。我可憐他們，願意用忠言答覆他們。」他的忠言是：他現在一心嚮往「思想改造」，「深悔前非，決心由自外於人民轉向於靠攏人民

<sup>99</sup> 佛洛姆(Erich Fromm)著，徐紀亮、張慶熊譯，《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7），頁 3。

<sup>100</sup>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冊 8，頁 371。

了」。<sup>101</sup>從賀麟與周炳琳的個案來看，蔣介石與中共政權對知識分子採取了兩種的不同策略，一採籠絡、一採改造，這兩者無疑地各有其功效，也在不同時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它們影響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命運，更凸顯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境。

---

<sup>101</sup> 這一則剪報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的檔案中，上面有胡適閱讀並以紅筆畫線的痕跡。檔號：HS-NK05-317-012。有關周炳琳在 1949 年之後所經歷的思想改造，見張友仁，〈周炳琳和趙迺搏的友誼〉，[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165198](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165198) (2009/9/10)；張友仁，〈周炳琳和梅貽琦的友誼〉，[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29139](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29139) (2009/9/10)。

附表：1948 年底蔣介石計劃營救的北京學者

(一) 在平教育行政負責人

姓名	籍貫	重要資歷 (1949年前)	1948年之職務	黨籍	1949年後去向
梅貽琦 (1889-1962)	天津	清華大學校長、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清華大學校長、12月任教育部部長，未就職	國民黨	1950年赴美國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1955年回台灣，任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書華 (1890-1979)	河北 昌黎	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立法委員、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國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	國民黨	1953年移居美國紐約，1957年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委員，病逝於紐約
袁同禮 (1895-1965)	河北 徐水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國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不明	赴美，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任職，病逝華盛頓
袁敦禮 (1895-1968)	河北 徐水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校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體育司司長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西北師範學院教授
李麟玉 (1889-1975)	天津	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國立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私立中法大學校長	中法大學校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國立北京中法大學校長
陳垣 (1880-1971)	廣東 新會	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史學系名譽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輔仁大學校長	輔仁大學校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加入共產黨
胡先驕 (1894-1968)	江西 新建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南京大學）農科教授，兼生物學系系主任。	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湯用彤 (1893-1964)	湖北 黃梅	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及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大副校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馮友蘭 (1895-1990)	河南 唐河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及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全國人大代表
葉企孫 (1898-1977)	上海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及理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全國人大代表，文革時期曾被捕
饒毓泰 (1891-1968)	江西 臨川	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及理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
陳岱孫 (1900-1997)	福建 閩侯	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及法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
鄭天挺 (1898-1981)	福建 長樂	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	北京大學秘書長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校長、全國人大代表
賀麟 (1902-1992)	四川 金堂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憲政實施促進委員會常委	北京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盟委員、1982年加入共產黨
鄭華燧 (1894-1933)	廣東 香山	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務長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沈履 (1896-?)	四川	清華大學教授、秘書長	清華大學秘書長	國民黨	不明

霍秉權 (1903-1988)	湖北 黃岡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清華大學 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 任東北工學院教 授、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民盟委員、1979 年加入共產黨
褚士荃 (1901-?)	江蘇 金山	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	清華大學 訓導長	不明	不明
黎錦熙 (1890-1987)	湖南 湘潭	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文學院院長	北京師範 大學文學 學院院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師 範大學教授、中國科 學院哲學社會科學 部委員、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
溫廣漢 (1902-1982)	安徽 肥東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河南省政府委員	北京師範 大學 訓導長	不明	留在中國， 任南京師範學院教 授、中國民革委員
黃金鰲 (1906-1997)	安徽 合肥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教務長	北京師範 大學 教務長	國民黨	赴台灣，任台中師範 學校校長
徐悲鴻 (1895-1953)	江蘇 宜興	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	北平藝術 專科學校 校長	不明	留於中國，任中央美 術學院院長

(二) 因政治關係必須離平者

姓名	籍貫	重要資歷(1949年前)	1948年 之職務	黨籍	1949年後去向
梅貽寶 (1900-1997)	天津	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校長、齊魯大學校長	燕京大學教授	不明	赴美國任衣阿 華州立大學教 授，退休後回台 灣任東海大學 教授
朱光潛 (1897-1986)	安徽 桐城	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北 京大學教授、全 國政協委員、中 國民盟委員

毛子水 (1893-1988)	浙江 江山	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赴台灣， 任台灣大學教授
邱椿 (1897-1966)	江西 寧都	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江西省政府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北京大學教授	青年黨	留在中國， 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張頤 (1987-1969)	四川 敘永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廈門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校長、四川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北京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 任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
陳友松 (1899-1955)	湖北 京山	廈門大學、北京大學社會系教授、中央黨部中央電影科專門委員	北京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 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民盟委員
劉思職 (1904-1983)	福建 仙游	北京大學醫學院、理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 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齊思和 (1907-1980)	河北 寧津	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歷史系教授	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不明	留在中國， 任北京大學教授
雷海宗 (1902-1962)	直隸 永清	中央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 任南開大學教授
劉崇鋮 (1898-1990)	福建 福山	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不明	赴台灣， 任台灣大學教授
戴世光 (1908-1999)	湖北 武昌	美國國情普查局統計研究室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北平市黨部監委	清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清華大學教授、民盟委員
邵循恪 (1911-1975)	福建 閩侯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	不明
吳澤霖 (1898-1990)	江蘇 常熟	大夏大學社會學教授、清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清華大學教務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民盟委員

趙鳳喈 (1899-)	安徽 和縣	清華大學政治系、法律系 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 授、北平市參議員、行憲 國大代表	清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	不明
敦福堂	河北 獲鹿	清華大學心理系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	不明
張恆					不明
金澍榮 (1907-)	廣東 番禺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 教授	國民黨	不明
英千里 (1900-1969)	北京	輔仁大學西語系教授、國 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 司長、第一屆國大代表	輔仁大學教授	國民黨	赴台灣， 任台灣大學、輔 仁大學教授
張漢民					不明
徐侍峰		輔仁大學教授	輔仁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輔 仁大學教務長

(三) 中研院院士

姓名	籍貫	重要資歷(1949年前)	1948年 之職務	黨籍	1949年後去向
俞大緘 (1901-1993)	浙江 紹興	私立金陵大學教授、中央研 究院院士、北京大學農學院 院長	北京大學農 學院院長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 農業大學校長、中 國科學院學部委 員、全國政協委員
許寶騷 (1910-1970)	浙江 杭州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副教 授、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 究院院士	北京大學 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國 科學院數學物理 化學學部委員、全 國政協委員
張景鉞 (1895-1975)	湖北 光化	北京大學植物系教授、中央 研究院院士	北京大學 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 大學教授、中國科 學院生物學部委 員
陳達 (1892-1975)	浙江 餘杭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中央 研究院院士	清華大學 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央 財經學院教授

戴芳瀾 (1893-1973)	湖北 江陵	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加入共產黨
李宗恩 (1894-1962)	江蘇 武進	貴陽醫學院院長、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協和醫學院院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四) 學術上有地位者

姓名	籍貫	重要資歷 (1949年前)	1948年之職務	黨籍	1949年後去向
楊振聲 (1890-1956)	山東 蓬萊	歷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昌大學、中山大學教授、青島大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北京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羅常培 (1899-1958)	北京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錢思亮 (1908-1983)	浙江 杭州	國立北平大學化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赴台灣，任台灣大學教授、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4年9月當選第五屆數理組院士、中央研究院院長 (1970年5月當選第五任院長))
馬祖聖 (1911-2007)	廣東 中山	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全家移居到紐西蘭、後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趙迺搏 (1897-1986)	浙江 杭州	歷任中央政治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
錢三強 (1913-1992)	浙江 紹興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所長	清華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全國政協委員、加入中國共產黨
嚴濟慈 (1900-1996)	浙江 東陽	歷任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研究院研究員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兼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代表，1980年加入共產黨
張政烺 (1912-2005)	山東 榮成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沈從文 (1902-1988)	湖南 鳳凰	歷任武漢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
邵循正 (1909-1973)	福建 福州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
鄧廣銘 (1907-1998)	山東 臨邑	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北京大學副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北京大學教授
李輯祥 (1903-1975)	陝西 西安	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設計委員	清華大學教授	不明	留在中國，任清華大學教授，1962年加入共產黨
孫毓棠 (1911-1985)	江蘇 無錫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國民黨	留在中國，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蒯淑平		暨南大學、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北京大學教授	不明	不明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 〈周炳琳駁海外奇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檔號：HS-NK05-317-012。
- 〈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51008。
- 〈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七四）〉，國史館藏：檔號：002090300197213，1948-12-17。
-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100148015。
-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100149011。
- 〈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100165022。
- 〈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80114018009。
- 〈蔣中正總統文物：愛記初稿〉，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200017011。
- 〈蔣中正總統文物：學記初稿（二）〉，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200012006。
- 〈蔣中正總統文物：學記初稿（二）〉，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60200012006。
- 〈蔣介石日記：1941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新青年》，卷6期4，1919。上海：亞東圖書館、求益書社。
- 吳宓，《吳宓日記》，冊4、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 宋祖良、范進編，《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 汪子嵩，〈讀《文化與人生》——紀念賀麟先生百年誕辰〉，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研究室編，《賀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約西亞·洛依思(Josiah Royce)原著，楊績譯，《忠的哲學》。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
- 胡適，〈問題與主義〉，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胡適，〈實驗主義〉，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冊6、8。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0。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
- 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撰，胡貽穀譯，《信仰的意義》(Meaning of Faith)。上海：青年協會，1929。
- 彭華，〈賀麟年譜新編〉，《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頁78-91。
-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收入氏著，《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 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人民日報》，1955年1月29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檔號：HS-US01-111-006。
- 賀麟，〈譯序〉，《黑格爾學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5。
- 賀麟，《現代西方哲學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賀麟，《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 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
- 潘公展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重慶：勝利出版社，1945。
- 魯一士(Josiah Royce)著，謝幼偉譯，《忠之哲學》。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
- 錢穆，〈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中央日報》，1975年4月16日。
- Royce, Josiah. *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 二、專書

- 方克立，《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 佛洛姆(Erich Fromm)著，徐紀亮、張慶熊譯，《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7。
- 何方昱，《「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與時代》月刊(1941-1948)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
- 李松林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大辭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 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上海：明權社，1903。
-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 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台北：龍文出版社，1994。
- 張太原，《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 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 張學智，《賀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 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 潘公展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潘公展先生紀念集》。台北：華岡印刷場，1977。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 三、論文

- 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 王奇生，〈蔣介石的閱讀史——以1920-1940年代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探討〉，「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9月14-16日。

-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25-147。
- 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桑兵，〈抗戰時期國民黨策劃的學人辦報〉，收入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台北：政大出版社，2008。
- 崔明忠，〈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研究（民國十六至三十六年）〉。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張道藩，〈我怎樣的參加中國國民黨〉，收入道藩文藝中心主編，《張道藩先生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
- 馮啓宏，〈花谿論英雄：侍從室第三處的人事工作析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7，2007年9月，頁119-164。
- 楚崧秋，〈張道藩先生與中國文藝〉，收入道藩文藝中心主編，《張道藩先生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
- 鄒振環，〈《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超越西方的一種嘗試和雄心〉，收入氏著，《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
- 熊自健，〈賀麟思想轉變探析——從唯心論到辯證唯物論〉，《鵝湖月刊》，期197，1991，頁15-25。
- 謝泳，〈晚年賀麟〉，收入氏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 Kyoungan, Bae. "Chiang Kai-shek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Life Reflected from His Diar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1, June 2009, pp. 1-10.

#### 四、網路資料

- 〈CC系〉，<http://baike.baidu.com/view/368044.htm> (2010/1/27)。
- 汪子嵩，〈往事舊友 欲說還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2/24/content\\_1328905.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2/24/content_1328905.htm) (2009/9/7)。
- 張友仁，〈經濟學教授周炳琳傳略〉，<http://www.05760576.com/Article/ls/rw/200611/345.html> (2009/8/31)。
- 張友仁，〈周炳琳和趙迺搏的友誼〉，[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165198](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tkey=&bkey=&doc_id=165198) (2009/9/10)。
- 張友仁，〈周炳琳和梅貽琦的友誼〉，[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29139](http://pk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29139) (2009/9/10)。
- 張友仁，〈周炳琳教授和胡適教授的友誼〉，<http://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6615> (2009/9/10)。

## Chiang Kai-shek and He Lin

Max K. W. Hu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 Lin and 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to investigate Chiang's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ir choice whether to stay in the Mainland in 1949, as well as their fate in the Communist thought reform movements of the 1950s. He Lin was noted for his scholarship on Spinoza and Hegel,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works into Chinese, and promotion of New Confucian philosoph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supporting Chiang's rule and hi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He Lin belonged to "The Warring States School" and "The School of *Thought and Times Magazine*" along with such scholars as Lin Tongji, Lei Haizong, Zhang Qiyun, and Qian M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 and Chiang was based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He Lin advocated 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 and criticized both communism and liberalism, and thus was highly praised by Chiang. What is intriguing in He's life is that in 1949 he decided to stay in the Mainland instead of going to Taiwan with Chiang. He was then subject to thorough thought reform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joined the party at the age of 80. This intellectual change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two different editions of his book entitl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in the 1945 edition he praised Chiang while in the 1986 edition he criticized Chiang and praised Mao. The case of He Lin indicat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taken toward intellectuals by Chiang and Mao Zedong and vividly reveals the predicamen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He Lin, Chiang Kai-shek, 1949, 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 Communist thought reform**

---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